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外国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前苏联)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李雨钱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钢… II. ①奥…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3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4

这就是国境。

两根柱子，它们默默而敌对地竖在那里，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面刨得很光，像警察岗亭一样漆了黑白相间的线条。在它顶上，牢固地钉着一只独头鹰，一双眼凶猛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它双翼展开，似乎正要用利爪去抓取那根漆着线条的界标；另一根柱子竖在对面6步以外，这是一根巨大的圆形的橡木柱，它深埋在地里。柱子顶上是一块画着锤子与镰刀的铁牌。尽管这两根界标都竖在平原上，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却有一条鸿沟。除非你要冒生命的危险，要不，要走过这6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乌克兰和资产阶级波兰的国界，就从钉着一个老鹰的柱子开始。小镇别列兹多夫在大森林里。离国境10公里，它对面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边防军某营的防区就是在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之间。

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有力地迈着步子，在他的防地里巡逻。天气很冷。雪在他的毡靴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穿

着灰色陆军大衣，佩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着长统毡靴。大衣的外面，又披着一件高领子的宽敞羊皮外套。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羊皮外套一直盖住脚跟，即使在冰天雪地里还是暖和的。他背着步枪，津津有味地抽着烟，在边境巡逻线上往来走动，皮外套不断刮着地面上的积雪。在这广阔的平原上，苏维埃国境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他们彼此可以望见。在波兰那面哨兵之间的距离则是两公里。

另一边，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哨兵迎面走来。他穿着粗制的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发亮的纽扣的黑外套、头上戴着四角的军帽。军帽上钉着一只白鹰标记，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也是鹰，但那些鹰并不能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刺到他的骨头。他走动的时候，一边用一只脚后跟敲打着另一只脚后跟，一边搓着麻木的耳朵。他那双戴着薄手套的手已经冻硬了。波兰哨兵片刻也不能停住，他一停下，寒气马上就会把他冻硬，所以只好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要小跑。现在那两个哨兵碰头了，那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一边的国境线上，与红军哨兵平行地走着。

国境上禁止谈话，但是，四周是一片荒原，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在默默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那波兰人很想吸烟，可他把火柴忘在军营里了。风好像

故意地把红军哨兵的马合烟的香味向他吹过来。那波兰人不再搓那冻坏了的耳朵了。他回头看了看,但是四面一个人也没有。雪在阳光下耀眼地闪烁着,天空没有一片雪花。

最先破坏公法神圣性的是那个波兰人。他把一支插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背到肩上,用冻僵了的手指头费力地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包廉价的烟卷,然后用波兰话说:

“同志,给根火柴用用。”

红军哨兵听到了他的请求,可是国境勤务的军令禁止士兵与境外的任何人交谈,他也不大明白波兰兵所说的话。因此他还继续走他的路。脚上穿的温暖而柔软的毡靴有力地把积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

“布尔什维克同志,扔给我一盒火柴,点一根烟卷。”那波兰人又说话了,这回是俄语。

那红军哨兵仔细地看了看他的邻人,心里想:“看样子他已冻得无法忍受了。虽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兵士,可他过的是悲惨的生活。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赶他出来放哨,只穿一件薄薄的布外套,冻得像兔子一样地跳着,不抽口烟实在不行啊。”因此,他连头也不回地把一盒火柴扔了过去。那波兰人顺手接住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总算把烟卷点着了。那盒火柴又用同样的方法被扔过来。红军哨兵无意间也破坏了公法,对他说:“留着吧,我还有。”

但是,从国境那面又传来了这样的回话:“不,谢谢你,我

有了这一小盒火柴，就有可能坐上两年牢。”

红军哨兵看着火柴盒。盒上印着一架飞机，代替螺旋桨的是一只有力的拳头，盒上写着这样的字：“最后通牒”。

“是的，他说的对。这对他们是不合适的。”他对自己说。

那个波兰哨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行巡逻——在这荒凉的平原上，一个人会感到十分孤独寂寞。

马在雪地上平稳而轻快地跑着，马鞍随着马的跑动有节奏地响着。黑公马鼻孔周围的毛上已经披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色水汽迅速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花骝马，神气地走着，时而把它那细长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它的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束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3个红色的方块，营长加弗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同伴的是红色的。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指挥着这70多公里长的防区上分布的一营人，他是这里的首长。他的同伴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民兵大队的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积雪很松软，表面没有一点痕迹。那两个骑马的人已走出林间的窄道，在旷野上策马跑着。侧面40步之外，又有了一对界标。

“吁，站住！”

加弗里洛夫突然紧紧地勒住马。保尔也跟着把马转过来，想看个究竟。他看到加弗里洛夫在马上俯下身子、认真地

察看雪地上—排古怪的迹印，那好象是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种狡猾的小野兽的脚印，它走动的时候，故意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而且还兜出许多古怪的圈子，叫人无法追寻它。要辨别出这些脚印从什么地方来是困难的。但营长察看的并不是这些野兽脚印。在这些脚印两步之外，另有一些已经被雪盖了的印迹。这里有人走过。那人并没有故意把脚印弄乱，而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的。脚印清楚地说明了他是从波兰方面来的。于是营长策马前进，跟着那脚印，一直走到哨兵线上。在波兰方面，那脚迹在十几步以外还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人夜里越境了，”营长嘟哝说，“这次又是穿过第三排的防区，可是在早晨的报告上，却只字没提。这些家伙！”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原本就有些灰白，加上现在由呼吸凝成的白霜，它们就变得雪白。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两个人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他枪上那支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另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骝马感到骑者用两腿夹它，就跑了起来，很快就到了那两个人的面前。

“同志，你好！你这地段有什么事吗？”营长把手伸给那哨兵，因为他的个子很高，所以营长几乎不用弯腰。那个大个子迅速除去手套，和营长握手。

那波兰兵从远处看着他们。两个红军军官向一个普通的

战士问好，好像他们是亲密的朋友似的！他马上就想象这仿佛是自己正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但是因为这种想法过于荒唐，所以他竟不由担心地向四周望望。

“我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哨兵报告说。

“你看见那边的脚印了吗？”

“还没有。”

“昨晚，从2点到6点，这里是谁值班的？”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啊，好的，您留神点，注意观察。”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警告那个哨兵说：

“您最好不要跟那些波兰兵并排地来回走！”

当两匹马沿着由边界到别列兹多夫的大路的时候，营长对保尔说：

“在边界上每时每刻都得瞪大眼睛。稍不留意就要出事。干这种工作不能睡觉。白天要偷越边界不太容易，但是到了晚上，你就得高度警戒。柯察金同志，您已看得出来，在我负责的这一段，有4个乡村是跨界的。在这儿工作特别困难。不管您怎样布置哨兵线，但一遇到了婚礼或是什么节日，亲戚们就要越过边境线，聚集在一起。怎能不越界呢？边界两旁的农家相距不过20来步，而这条小河，连鸡也能趟过去。走私的事情也是难免的。比如说，一个老太婆偷带了两瓶波兰产的40度的香草酒，这自然是小事；可是还有很多大走私犯，

他们的胃口是很大的。你知道那些波兰人在干些什么吗？他们在边界的各村里都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在那里你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那些贫穷的农民开设的。”

保尔很有兴致地听着营长的话。他觉得守卫边界的生活就像不间断的侦察工作一样。他问道：“告诉我，加弗里洛夫同志，事情仅仅是走私吗？”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问题就在这里啊！”

别列兹多夫是一个小镇。这个偏僻的村镇从前是指定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镇上的二三百户人家杂乱地挤在一起。一个很大的集市广场，广场中间有 20 来家可怜的小店。市场很肮脏，到处是马粪。小镇周围挤着许多农民的住宅。从犹太人居住区通往屠宰场的路上，有一个破旧的老犹太教堂。教堂虽然还吸引很多人，但是，它的情况已经不如从前，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来 1917 年所发生的的确不妙，因为甚至在这个敬神的地方，青年人对祭司也不再尊敬了。是的，那些老头儿还没有“开斋”，但是已有许多小孩子都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真让人恶心的！一只猪在粪堆起劲拱着找吃的，气得祭司鲍鲁赫走向前踢了它一脚。别列兹多夫镇成了区中心，这也让这祭司很不高兴。不知从哪里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闹得一天比一天厉害，一天比一天叫他不痛快。昨天，鲍鲁赫看到在神父庄园的

大门口挂了一块“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的新牌子。

挂这牌子一定不是什么好事情。他边走边想，一直走到教堂门口，才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小布告，上面写着：

今晚执委会主席利锡增同志和共青团区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在劳动青年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闭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气愤地把那张布告从门上撕下来。“瞧，真地干起来了！”

本镇的小教堂有两面紧挨着从前神父庄园的大花园，那花园正中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从前，神父和他的妻子都住在那儿，他们过着糜烂空虚的生活。可是，新主人一搬到这所房子里，那种空虚寂寞的气氛立刻就消失了。从前虔诚信教的主人只在盛大节日接待客人才使用的那间大客厅每天都挤满了人，神父庄园现在已改为别列兹多夫党委会的办公处。进前门往右拐，一个小房间的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保尔每天都在这里花去他的一部分时间，因为他除了担任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还兼任新成立的共青团区委的书记。

保尔把一堆公文推到一边，靠在椅子上想起在安娜家里

举行的那次愉快的晚会到现在，已经8个月了。但回想起来好像是不久前的事情。

夜深了，屋子里很静。党委会里的人都走了。最后区委书记特罗菲莫也走了，屋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窗户上布满了寒气凝成的霜花。桌上摆着一盏油灯。火炉烧得很热。保尔在回忆不久前的事情。8月里，铁路工厂的共青团派他组织一批青年，随修理车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去。一直到深秋，他一直带着150个青年，由这个车站到那个车站，修理被烧毁的和被破坏的车辆。他们的路线是从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这里从前是马赫诺匪帮控制的地方，到处都是被破坏的残象。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曾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去修理石头筑成的水塔和修补被炸坏的水箱。保尔本人是一个电工，他不懂得钳工的技术，也没干过这种工作，但是 he 在这儿亲手用扳手拧紧了无数的锈螺丝帽。

深秋时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的工厂。工厂各车间都欢迎这150个人的归来。

现在，在安娜那里又可以经常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消失了。他那富有感染性的笑声也时常可以听到了。

一群满身机油的弟兄们现在又可以在学习小组上听他讲从前各种斗争的故事了。他讲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企图推翻沙皇宝座的故事，讲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安娜那里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意外地戒除了几乎从小就养成的抽烟的不良习惯。那天他忽然斩钉截铁地说：

“从今以后，我决不再吸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非常突然。原来当时有人争论说：习惯的力量大于人的意志力，一经养成就难以克服，抽烟就是一个例证。接着大家就议论纷纷。保尔始终保持沉默，可是塔莉亚偏不许他沉默，硬要求他发表意见。于是他说：

“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应让习惯支配。我们能够得出别的结论吗？”

茨维塔耶夫在墙角喊起来了：

“话倒说得挺好听。柯察金就喜欢说漂亮话。戳穿他的牛皮来看呢？问他自己抽不抽烟？抽的。他知道不知道抽烟有害？知道的。可是能不能戒掉——戒不掉。不久前，他还在小组会里‘传播文化’呢。”说到这里，他带着嘲弄的口吻问道：“让他答复我们，他现在还骂人不骂人？凡是认识保尔的，都可以那么说：骂是骂得少了，但是骂起来就很厉害。说着容易做着难啊！”

一阵沉默。茨维塔耶夫尖刻的话使大家很不愉快。保尔并没有立刻答复。他从嘴边慢慢地拿下烟卷，把它揉成碎末，轻轻地说：

“从今以后，我决不再抽烟。”

沉默了一下，又补充说：

“这固然为了我自己，也多少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去掉他的坏习惯，那就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习惯。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毛病。不过，就是茨维塔耶夫同志自己也承认我现在很少骂人了。骂人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现在还不敢夸口说连这个坏习惯也一齐改掉。不过我一定会把骂人的习惯也彻底改掉的。”

初冬，很多顺河放下来的木筏堵积在河里。顺河漂走。索罗缅卡区派出自己的团员去打捞秋天的洪水冲散的许多宝贵的木材。

保尔不甘落后，冒着重感冒与同志们一道下来。一星期后，当河岸上的木材已堆积成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寒冷的秋风又加剧的病情，保尔又发烧了。他得的是急性风湿病，在医院住了两星期，他从医院回工厂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车间的工长看见了，愁得直摇头。几天后，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職，并且给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他生气地拒绝了这项权利。

保尔十分痛苦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慢慢走着，一动就疼得更厉害。以前，他母亲曾几次写信叫他去看她，现在他想起老太太与他分别时所说的话了：“只有在你们

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他到省委领了两张证件：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伤感，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到他母亲那里去了。在半个月里她不停地用熏和按摩他那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丢开了手杖也能走路了。喜悦又浮上了他的心头，黄昏又变成黎明。列车把他载到省城。3天后，组织部就交给他一个文件，派他到省军事委员部下面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一星期，他就来到了遍地是雪的小镇别列兹多夫，作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共青团地方委员会又叫他负责把分散在这新区各地的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组织。他新的生活又开始了。

冬去春来，到了盛夏，一支樱桃树枝正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口伸过来。在办公室对面，有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它尖顶钟楼上的金黄色十字架，像一团火似的在阳光下闪烁着。窗外小花园里有一小群跟周围的小草一样的淡绿色的、毛茸茸的鹅雏，正在敏捷地觅食物。这些鹅雏是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委会主席读完刚接到的紧急电报。脸上闪过一道阴影。

24岁的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利锡增是个魁伟强健的也是非常严峻的，有时候甚至是可怕的，看上去他足有 35 岁。他身体结实，生着一个大脑袋，目光锐利冷静，下颔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马裤和“见过世面”的弗列奇式灰军服上衣，左胸口袋上挂着红旗勋章。

利锡增十月革命前在图拉兵工厂当车工。他祖孙三代几乎都是从儿童时代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切铁、削铁。以后，革命和党不断地把他从这一个战场投入另一个战场。这个图拉的兵工厂工人经过一段光荣的道路，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和团政治委员。

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了。现在尼古拉·利锡增被派到国境地区，过着有规律的平静生活。他常研究关于农作物收获的报告，但是他刚接到的急电又使他想起了不久前的事情。那简略的电文这样说：

绝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锡增。国境发现波兰派出的大批匪徒，可能骚扰国境区。应采取预防措施。把财务科的款项及其他有价值物品移至州中心，勿留税款。

从窗户望出去，利锡增可以看见每个走进区执行委员会来的人。他看见保尔·柯察金正站在台阶上，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请坐，我们谈谈。”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整整一个小时，

利锡增主席一直在与保尔谈话。

保尔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正午了。利锡增的小妹妹妞拉正从花园里跑出来。保尔一向都叫她安妞特卡。她是一个怕羞的小女孩，她的庄重与年龄很不相称。平常她看见了保尔，总微微一笑，这回，她也是用小孩子的方式羞答答地问候了保尔一声。

“是利锡增一个人在那儿吗？我嫂子等他吃饭等了很长时间了。”

“安妞特卡，你去吧，屋里就他一个人。”保尔说。

第二天凌晨，3辆马车已经赶到执行委员会来了。随车的人都用极低的声音谈话。几只密封的袋子由财务科搬出来，放到车子上。几分钟后，车又离去了。一队由保尔率领的武装卫队一直护卫着车辆。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离小镇40公里——其中有25公里全是森林——的州中心，把公文和钱币储放在州财务处的保险柜里。几天后，又有一个骑马的人由国境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

到了执行委员会门口，骑马的人翻身下马，扶着他的军刀，迈着笨重的脚步，有力地走上台阶。利锡增皱着眉，收下那人送来的信，在信封上签了他的名字。接着，那边防军人立刻跃上马鞍，沿原路回去了。

那封信的内容，只有刚看过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知道。但是别列兹多夫小镇的市民们却敏感地嗅着了。当地每3个

小商人中,定有两个是小走私贩,这种行业使他们养成了一种预测危险性的本能。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匆匆向民兵大队部走去。其中一个就是保尔。当地的居民全认识他,他总是带着枪的。可是,今天连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也扎起了武装带,佩上了左轮手枪,这就意味着有什么不妙的事情发生了。

几分钟后,从大队部里跑出了15个人,手里提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向十字路口的那个磨坊奔去。其余的党团员也都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戴着哥萨克皮帽子,腰间挂着他的毛瑟枪,骑马跑过去了。显然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广场上或者小巷里,全都死一般的寂静,小铺子的门都上了大锁,窗板也都关起来了。只有那些不知害怕的母鸡和发喘的猪,还在粪堆上一个劲地找东西吃。

在镇边一些园子的围墙上,都设置了了望哨。

利锡增刚才接到的报告是很简单的:

昨夜一伙骑匪窜入斯拉武塔森林后即失去踪迹。约百余人,配轻机枪两挺。请即采取有效措施。兹预先通知您:本日将有百名红军哥萨克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切勿误伤。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弗里洛夫